

试论伊拉克什叶派乌里玛的政治作用^{*}

李福泉

(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 陕西西安 710069)

摘要: 什叶派独特的乌里玛等级制度和效仿制度是乌里玛发挥政治作用的有利条件。自1921年伊拉克建国, 什叶派乌里玛经历了从短暂的政治干预, 到长期的沉默无为, 再到走向与政府对抗的变化过程。总体而言, 随着国家权力的逐渐强大, 什叶派乌里玛的政治作用和社会影响力呈缩小趋势。伊拉克战争后, 什叶派乌里玛成为国内政治舞台上的重要力量。但是, 从长远看, 他们的政治作用将受到限制。将来, 奉行政治行动主义的乌里玛只能通过正常的政治途径分享国家权力, 而其他则将逐步退回疏远政治的传统。

关键词: 伊拉克; 什叶派; 乌里玛; 政治作用

中图分类号: B9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 1026(2005)01- 0024- 05

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爆发以后, 随着复兴党政权的倾覆, 什叶派乌里玛成为伊政治舞台上的重要力量。无论是温和的阿里·西斯塔尼(Ali Sistani), 还是激进的穆克塔达·萨德尔(Muqtada al-Sadr), 都以不同的方式对现今伊拉克的政治局势产生了重大影响。那么, 什叶派乌里玛为什么会有如此大的政治影响力? 他们在现代伊拉克80多年的历史进程中曾经发挥了怎样的政治作用? 这种作用又有怎样的发展趋势呢?

一 什叶派乌里玛的特殊地位

在中东, 伊斯兰教在穆斯林生活中居于重要地位, 相应地, 掌握了宗教知识的乌里玛在穆斯林中享有很高的威望。而与逊尼派乌里玛相比, 什叶派乌里玛的地位更为特殊, 社会影响也更大, 这与什叶派独有的乌里玛等级制度和效仿制度密切相关。

什叶派乌里玛分为不同的等级。最低级的是希卡特伊斯兰(thiqa al- islam), 在此之上是有教法创制权的穆智泰希德(mujtahid)。穆智泰希德又分为三个等级: 低级的被称做霍贾特伊斯兰(hujjat al- islam); 高级的被称作阿亚图拉(ayatullah); 最高级的被称作大阿亚图拉。大阿亚图拉就是“效仿渊源”, 可简称“渊源”。同一时代往往有多个效仿渊源, 在这些效仿渊源中, 有时又存在一个最高效仿渊源, 享有最高宗教权威。乌里玛的等级越高, 人数便越少。如在20世纪80年代, 伊朗穆智泰希德的数目是: 霍贾特伊斯兰约5000人, 阿亚图拉约50人, 大阿亚图拉仅4人。^{[1](P.85)} 现今在伊拉克纳贾夫的西斯塔尼就是大阿亚图拉级别的穆智泰希德。

穆智泰希德在乌里玛阶层中居于核心地位。他们是隐循伊玛目在世间的代理人, 拥有代替其执行教法权力的法定地位。更重要的是, 他们握有伊智提哈德(ijtihad, 教法创制)权力, 运用这项独有的权力, 他们可以在许多重大社会问题上颁布“法特瓦”(fatwa, 法律裁决), 发表自己的看法。虽然他们的意见在原则上对教徒并不具有强制性的约束力, 但往往对其行为产生巨大的影响。而且, 穆智泰希德在颁布的法特瓦中, 可以把不同看法或意见宣布为“异端”, 这种方式运用在政治上, 就可以宣布一个不虔诚或暴虐的国王或政治家为异教徒, 这实际上就为乌里玛干预政治事务铺平了道路, 穆智泰希德由此也成为乌里玛阶层中的领导力量。^{[2](P.194)}

* 收稿日期: 2004- 11- 11

作者简介: 李福泉(1978-), 男, 甘肃兰州人, 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硕士研究生。

乌里玛中的不同等级称号不仅是掌握宗教知识多少和信仰虔诚程度的标志,也是追随者(效仿者)多寡的证明,还是社会声望高低和影响力大小的表征。根据什叶派主要教法派别乌苏勒派的规定,每个什叶派穆斯林必须效仿一个在世的穆智泰希德,与他商议有关的宗教事务。^{[3](P.7)}而且,效仿者每年要把净收入的十分之一作为奉献交给自己的效仿对象。不但普通穆斯林要有自己的效仿对象,低级的穆智泰希德也要选择大阿亚图拉作为效仿目标。这样,穆智泰希德的权力和影响力的大小就直接取决于效仿者的多少以及在其开设的宗教课程里听众的多少。大阿亚图拉的追随者往往跨越了国界,遍布许多国家。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学生学成回国后,传播他的思想,进一步扩大其影响。现今在纳贾夫的大阿亚图拉西斯塔尼就不但在伊拉克什叶派中享有宗教领袖的崇高地位,而且在伊朗、巴林、印度等国家有大量追随者。穆智泰希德的效仿者越多,所得的奉献也就越多。身处高位的大阿亚图拉往往拥有巨额财富,他们利用自己所掌握的钱财创办图书馆和学校,建立诊所或医院,向穷人施舍,天灾战乱时给教徒提供救济,这些活动成为其在穆斯林大众中树立权威、扩大影响的最有效手段。1918年,纳贾夫大阿亚图拉亚德兹(Yadzi)独自一人就施舍了约10万英镑的财物。^{[4](P.190)}雄厚的经济实力为乌里玛社会地位的确立奠定了重要基础,也使他们不同于逊尼派乌里玛在经济和政治上对政府的依附状态,享有了很强的独立地位。

借助于独特的等级制度和效仿制度,什叶派具有了比逊尼派更强的凝聚力,什叶派乌里玛也拥有了逊尼派乌里玛远远无法相比的社会影响力。不过,尽管什叶派乌里玛有干预政治的便利条件,但在什叶派宗教界却长期存在避免涉入政治的保守力量。他们认为,统治世界是留给隐循伊玛目的特权,穆智泰希德不应据有政治权力。^{[3](P.7)}然而,不断有乌里玛突破这一约束,尤其在19世纪后期以来,越来越多的什叶派乌里玛利用自身无可比拟的号召力和影响力,干预政治事件,影响政治进程。在20世纪,随着中东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和世俗化的不断推进,什叶派乌里玛的地位受到极大的冲击和削弱,但在宗教语言最容易被普通穆斯林大众理解的情况下,他们仍然对国家和社会具有不可小视的影响力。相比世俗政治权威,他们这种宗教权威具有更加顽强和持久的生命力。有时候,什叶派宗教界能对中央政权形成巨大的挑战,在特殊形势下,乌里玛甚至会取代世俗力量,直接行使国家大权。现在的伊拉克和伊斯兰革命以来伊朗的情况恰恰表明了这一点。

二 历史上伊拉克什叶派乌里玛的政治作用

从1921年建国到2003年伊拉克战争爆发,伊拉克什叶派乌里玛经历了从短暂的政治干预,到长期的沉默无为,再到与政府走向对抗的历史过程。总体而言,随着国家权力的逐步强大和世俗化政策的实施,什叶派乌里玛的政治作用和社会影响力呈逐渐缩小的趋势。

在奥斯曼帝国统治时期,伊拉克什叶派享有半自治的地位,乌里玛相对自由地处理整个什叶派社团的社会和宗教事务,但是对整个帝国政治,他们则持不干预的态度,极少发表自己的意见。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伊拉克进入了剧烈变动的时代。面对极度混乱和前途未卜的形势,什叶派乌里玛迅速进入了伊拉克政治运动的最前台。当英军从海湾侵入伊拉克后,乌里玛宣布发动吉哈德(jihad,圣战),号召南部各部落打击异教徒,部分乌里玛甚至走上前线,直接参与战斗。虽然抵抗活动最终失败,英军占领了整个伊拉克,但是,随着奥斯曼帝国的崩溃,什叶派乌里玛的参政热情急剧高涨。他们作为什叶派利益的代言人,企图参与甚至主导伊拉克事务。^{[5](P.55-75)}1919年,阿亚图拉塔吉·设拉齐(Taqi Shirazi)发布法特瓦,宣布“除非穆斯林,任何人无权统治穆斯林”^{[6](P.16)},以此反对英国的殖民统治。在1920年英国正式托管伊拉克后,什叶派乌里玛再度号召穆斯林发动起义。但仅过了3个月,起义就遭到英军镇压。1921年,英国立费萨尔为国王,形式上的伊拉克民族国家正式建立。而在此时,乌里玛在国内的影响力也达到了顶峰。他们频频利用自身独特的地位,动员广大教徒,给政府施加压力,这严重损害了新生国家的权威。自此,削弱甚至消除乌里玛的政治影响力成为伊拉克历届政府的一贯政策。

什叶派乌里玛很快就与政府发生了矛盾。1922年,政府开始国会选举,以批准确定与英国托管关系的英伊条约。穆智泰希德接连发布多个法特瓦,禁止穆斯林参加选举,许多人听从号召,选举被迫停止。费萨尔国王决心采取强硬措施,1923年6月,阿亚图拉马赫迪·哈利希(Mahdi al-Khalisi)遭逮捕后被驱逐出境。为表示抗议,9个著名的穆智泰希德随即离开圣城,移居伊朗库姆。1924年,在作出不再干预政治的保证后,他们被允许返回伊拉克^{[5](P.83)},而在这时国会选举早已结束,英伊条约也已获通过。这次事件使什叶派乌里玛的威望受到沉重打击,自此,他们结束了短暂的政治干预期,重返疏远政治的传统。费萨尔借此时机加强了对乌里玛的控制。政府设立了瓦克夫部,取代乌里玛管理宗教基金。越来越多的案件

由国家世俗法庭而非宗教法庭审理。在教育领域,政府建立大量世俗学校,与乌里玛主办的宗教学校展开竞争。1929年,政府甚至在什叶派圣城纳杰夫设立了一所女子学校,招收女童,进行世俗教育。^{[6](P.19)}到50年代初,乌里玛对国家政治、教育和司法的影响已微乎其微。

但是,形势的发展促使乌里玛改变了这种无所作为的局面。20世纪20年代后期,阿拉伯民族主义在伊拉克迅速传播,吸引了大批追随者。1934年伊拉克共产党成立后,共产主义在年轻人中产生了广泛影响。这对乌里玛的地位和伊斯兰信仰形成巨大冲击。严重的危机感迫使他们改变了不干预政治的态度。50年代初,乌里玛曾企图寻求政府的合作,以与共产主义作斗争。^{[6](P.23)}1957年,在阿亚图拉穆赫辛·哈基姆(Muhsin al-Hakim)的支持下,以穆罕默德·巴吉尔·萨德尔(Muhammad Baqir al-Sadr)为首的改革派乌里玛成立了伊斯兰召唤党。这是现代伊拉克第一个有较大影响的伊斯兰政党,它的成立,标志着什叶派乌里玛政治意识的再度觉醒。

1958年,君主制被推翻后,卡塞姆和阿里夫兄弟相继执政,乌里玛的地位遭到进一步削弱。卡塞姆执政初期以伊共为主要依靠力量。伊共借机扩大势力,并公开攻击乌里玛,把其视为人民进步和国家现代化的障碍。为了反击共产主义的“进攻”,1958年底,阿亚图拉哈基姆又授权成立了“乌里玛协会”。它由改革派乌里玛组成,主要活动包括募集宗教基金,增建宗教学校,创办报纸期刊等。阿亚图拉哈基姆和其他穆智泰希德还发布多个法特瓦,谴责伊共的活动,宣布加入伊共即为叛教。这使卡塞姆政府处于尴尬的境地。卡塞姆多次提出拜访哈基姆的要求,但都被后者拒绝。

乌里玛还反对政府的许多改革措施。卡塞姆上台后推行土地改革,但部分由于什叶派乌里玛的压力,政府把无偿收回地主土地改为向地主提供一定的补偿。卡塞姆又修改了个人身份法,废除了一夫多妻制,给予妇女与男人同等的财产继承权,这违背了传统的伊斯兰教法,遭到了乌里玛的强烈反对。^{[6](P.34-35)}同样,阿里夫时期推行的大规模国有化政策,因没收私人财产违反了伊斯兰教法而引起宗教界的广泛抗议。不过,这时什叶派乌里玛并不愿与政府直接对抗,他们仅限于用和平方式反对政府的某些政策和措施。1965年10月,处于流亡中的霍梅尼来到纳杰夫,劝说乌里玛对伊拉克和伊朗政府采取政治行动,但遭到拒绝。伊拉克什叶派乌里玛只想通过渐进和非暴力的策略,借助教育和宣传的方式,达到建立伊斯兰国家的目标。^{[6](P.41)}

1968年复兴党上台后,什叶派乌里玛与政府的关系迅速恶化。1969年4月,总统贝克尔要求阿亚图拉哈基姆就阿拉伯河争端公开谴责伊朗政府,但被后者拒绝。于是,政府驱逐了在纳杰夫的伊朗籍宗教学生,关闭了库法宗教大学,没收了其财产。6月,哈基姆率领由乌里玛和商人组成的抗议队伍从纳杰夫来到巴格达,在那里数以千计的教徒赶来向他表示效忠,这使复兴党感到极为震惊。哈基姆的儿子马赫迪·哈基姆(Mahdi al-Hakim)被捕,并被指控为以色列的间谍。^{[7](P.202)}而且,政府还史无前例地关押了许多参加抗议活动的乌里玛,甚至把一个宗教学者迫害致死。这充分暴露了复兴党政权的凶残性。哈基姆发布法特瓦,禁止穆斯林加入复兴党,结果引来更大规模的迫害。

1970年,哈基姆在巴格达去世,他的追随者转而效仿阿亚图拉萨德尔和阿亚图拉霍伊(Khoei)。霍伊奉行不干预政治的立场,而萨德尔则是一个坚决的政治行动主义者,主张乌里玛参与政治,建立伊斯兰国家。就在这年初,霍梅尼在纳杰夫发表了一系列演讲,严厉批评沉默无为的乌里玛,大力宣扬“教法学家统治”的思想。这在伊拉克什叶派乌里玛中产生了一定影响。

70年代中期以来,复兴党大大加强了对社会的控制,引起了宗教界和广大群众的强烈不满。1977年2月,乌里玛组织了约3万名什叶派穆斯林从纳杰夫向卡尔巴拉出发,沿途高喊反对复兴党和贝克尔的口号,试图以此改变政府的高压政策。结果,政府派军警截击,杀死16人,逮捕约2000人。^{[6](P.51-52)}1978年底,伊朗伊斯兰革命爆发。为防止伊拉克什叶派暴动,1979年7月,政府软禁了萨德尔。包括乌里玛、大学师生、工人、农民在内的许多人来纳杰夫向萨德尔宣誓效忠。萨德尔成为什叶派反政府力量的领袖。各地也爆发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政府军杀死了几十人。年底,又有一批乌里玛被处死。政府的血腥屠杀使乌里玛希望与政府和平共处,通过非暴力方式建立伊斯兰国家的幻想彻底破灭。萨德尔号召全体穆斯林发动起义,推翻复兴党政权。^{[6](P.54)}召唤党等伊斯兰政党纷纷建立军事组织,袭击政府目标,暗杀萨达姆等复兴党领导人。1980年3月,在副总理塔里克·阿齐兹(Tariq Aziz)遭未遂暗杀图谋后,萨德尔被处死。这使什叶派乌里玛的反政府运动遭受沉重打击。

两伊战争爆发后,为了确保国内局势的稳定,萨达姆对反政府的乌里玛采取更加严厉的镇压措施。在严酷的形势下,大批乌里玛逃离伊拉克。1982年11月,已故阿亚图拉哈基姆之子巴吉尔·哈基姆(Baqir al-Hakim)在伊朗宣布成立了伊拉克伊斯兰革命委员会(简称伊革委)。它受到伊朗的大力支持,是伊拉

克国外最主要的什叶派反政府组织。

90年代初,在海湾战争结束之际,南部什叶派发起了反对萨达姆统治的全民性大起义,许多乌里玛参与其中,伊革委派遣其下属军事组织巴德尔旅(Badr Brigade)潜入伊南部,企图领导起义。但仅仅一个月,起义便惨遭镇压。一些乌里玛被逮捕或处决,大阿亚图拉霍伊被软禁,直到1992年8月去世。阿里·西斯塔尼和萨迪克·萨德尔(Sadiq al-Sadr)继而成为大阿亚图拉。西斯塔尼承袭了霍伊只管宗教不问政治的立场,而萨迪克·萨德尔则与其堂兄巴吉尔·萨德尔一样持强烈的反政府态度。他暗中恢复被政府禁止的星期五聚礼活动,多次公开抨击萨达姆政权。^{[8](P.33)}1999年,萨迪克·萨德尔和他的两个儿子遇害身亡。到2000年,经过政府多年的迫害与屠杀,伊国内除了不愿涉入政治的大阿亚图拉西斯塔尼外,再无有声望的乌里玛。^{[9](P.60)}萨达姆终于把国内的什叶派宗教界完全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

三 现状与前景

2003年3月20日,美英入侵伊拉克,萨达姆政权迅速土崩瓦解,整个国家陷入了短暂的无政府状态。包括什叶派伊斯兰政党在内的各反政府组织纷纷从国外返回,它们连同国内的什叶派力量迅速填补了伊南部的权力真空。什叶派乌里玛开始广泛参与政治,通过各种途径影响伊拉克的政治进程。战争爆发后,什叶派乌里玛中涌现出了4股重要力量。

一个是 大阿亚图拉西斯塔尼。他是当前伊拉克什叶派最高宗教领袖,是大量什叶派穆斯林的追随对象。伊战爆发后国内混乱的局势促使他改变了原本不干预政治的立场。4月3日,西斯塔尼发布法特瓦,要求什叶派穆斯林不要干预美军的军事行动。4月9日,巴格达被美军占领后抢劫事件频繁发生。为此,他再次发布法特瓦,呼吁民众将抢来的财物送回原处,结果绝大多数人听从了号召。这充分表明了他作为大阿亚图拉在什叶派中的崇高威望。西斯塔尼反对国内各派使用暴力达到政治目的。

另一个是阿亚图拉巴吉尔·哈基姆和阿齐兹·哈基姆兄弟。他们长期从事反对萨达姆政权的斗争,80年代以来留居伊朗,主张在伊拉克建立伊朗式的伊斯兰共和国。他们领导的伊革委是当前国内最强大的政治组织之一,它拥有约1万人的军事组织巴德尔旅。

第三个是阿亚图拉马吉德·霍伊(Majid al-Khoei)。他是大阿亚图拉霍伊之子,自1991年起居住在伦敦,管理着霍伊基金会。他受到美国的有力支持^{[10](P.555)},是伊拉克宗教和政治领袖的有力竞争者。

最后一个是穆克塔达·萨德尔。他是被萨达姆政权暗杀的大阿亚图拉萨迪克·萨德尔之子,被他父亲的追随者视为其权威的合法继承人。^{[11](P.16)}穆克塔达只有30岁,还没有从宗教学校毕业,不具有穆智泰希德的称号,但是他借助家族的崇高声望和不妥协的反美立场,吸引了大批的穆斯林青年。他组建了“马赫迪军”,积极争夺什叶派的领导权,向其他所有什叶派领袖发出了严峻挑战。4月10日,霍伊抵达纳杰夫后仅仅一周,就被穆克塔达的追随者杀死。与此同时,西斯塔尼的住所被包围。穆克塔达要求他立刻离开伊拉克(西斯塔尼来自伊朗)。穆克塔达也谴责了哈基姆兄弟,认为他们以前不应该逃离祖国。对美国,穆克塔达持强硬的反对态度,要求美军马上撤离伊拉克。4月28日,美军加纳将军在纳西里耶召开伊拉克领导人会议,伊革委派出了代表,穆克塔达则拒绝参加。

显然,什叶派乌里玛已成为伊国内举足轻重的政治力量,尤其是西斯塔尼和穆克塔达更是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力。7月13日,伊拉克临时管理委员会成立,伊革委副主席阿齐兹·哈基姆是成员之一,穆克塔达因其强烈的美国色彩而拒绝加入。西斯塔尼则对它的成立予以谴责。他号召约10万群众走上巴格达街头,要求直接选举政府成员。^{[12](P.66)}这无疑严重削弱了临管会在广大穆斯林心目中的合法性。8月29日,阿亚图拉巴吉尔·哈基姆在纳杰夫被炸身亡。伊革委受到沉重打击,它也随即开始要求美军马上撤离。伊革委与穆克塔达的对美立场趋于一致。巴吉尔·哈基姆的死,也消除了穆克塔达的一个有力竞争者。在几个月的时间里,穆克塔达逐步控制了萨德尔城、库法、阿马拉等城市的主要清真寺,在纳杰夫、卡尔巴拉和巴士拉等地他也有较强势。随着穆克塔达势力的不断壮大,他与美军和临管会的矛盾不断激化。2003年10月10日,穆克塔达甚至自行成立了一个政府,并自任总统,公然与美国控制下的临管会对抗。^{[13](P.30)}2004年4—5月间,穆克塔达的马赫迪军与美军在纳杰夫、萨德尔城和巴士拉等地发生激烈冲突,穆克塔达俨然成为伊国内的反美领袖。6月1日,伊拉克过渡政府宣告成立。6月28日,美军提前向其“交权”。穆克塔达与马赫迪军的活动对过渡政府和美军形成重大威胁。8月初,马赫迪军与美军在纳杰夫发生激战。过渡政府为建立权威,向穆克塔达发出解除马赫迪军武装的最后通牒。双方陷入了全面对抗的边缘。8月底,赴英国治病的西斯塔尼返回伊拉克,提出了外国军队撤出纳杰夫、使纳杰夫和库特

“非武装化”等和平建议。双方表示接受,从而化解了这场延续 3 周的严重危机。西斯塔尼借此再度显示了自身的威望,成为这次冲突的最大赢家。但是,穆克塔达与美军在别处的冲突仍然持续不断。

复兴党政权覆灭一年多以来,什叶派乌里玛从萨达姆时期受打击和迫害的对象,变成了现今伊拉克政治舞台上的重要角色。这是世俗政治权威崩溃的直接结果,也是阿拉伯民族主义和复兴社会主义等世俗主义思想在伊拉克失败的曲折反映。现在的国内形势恰如 1921 年伊拉克建国之初的政治状况:中央政府靠外力扶持(当时是英国,现在是美国)而软弱无力,乌里玛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影响国家政局。什叶派圣城纳杰夫作为又一个权力中心,与巴格达展开强有力的竞争。然而,也正如君主制建立后,随着国家权力的强大,什叶派乌里玛丧失了政治发言权一样,从长远看,他们不可能长期如此大规模地影响国家的政治进程,更不可能像伊朗乌里玛一样直接主导和掌控国家大权。在世俗化已成为世界总趋势的今天,国家政权和宗教力量两者此消彼长,相互间存在着难以调和的矛盾。现在,奉行世俗原则的过渡政府已经建立,为了重建国家权威和稳定社会秩序,中央政府必将使用政权力量,逐步限制乌里玛利用宗教身份介入政治。当然,面对当前国内重重矛盾和无数困难,政府若要达到目的必将经历一个长期的过程。将来,什叶派乌里玛将走向两种不同的发展道路:部分将以政治家身份,通过正常的政治渠道分享一定的国家权力;其他则将逐步恢复不干预政治的传统。为了求得生存,穆克塔达等持激进立场的乌里玛将软化自己的立场,转变为体制内的政治家,马赫迪军则可能会像 90 年代初的黎巴嫩真主党一样,从一个军事组织变为政治组织^[14](P. 215-220),进而最终纳入整个国家的政治进程。2004 年 8 月底以来,穆克塔达就曾多次宣布要参加 2005 年 1 月的全国大选。大阿亚图拉西斯塔尼虽然是当前不少政治事件中的重要角色,但是,他并不主张建立伊朗式的伊斯兰国家,也反对霍梅尼“教法学家统治”的思想。以后,随着国家秩序的稳定和安全形势的好转,他极有可能逐步放弃现今对国内政治有限干预的做法,最终回复专注于宗教的传统。

参考文献:

- [1] 吴冰冰. 什叶派现代伊斯兰主义的兴起[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4.
- [2] 金宜久. 伊斯兰教[M]. 北京: 宗教文化出版社, 1997.
- [3] Abbas Kelidar. The Shi'i Imami Community and Politics in the Arab East[J]. Middle Eastern Studies, vol. 19, no. 1, 1983.
- [4] Hanna Batatu. Shi'i Organization in Iraq[A]. Juan R. I. Cole and Kikki R. Kedale. Shi'ism and Social Protest[C].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6.
- [5] Yitzhak Nakash. The Shi'is of Iraq[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4.
- [6] Joyce N. Wiley. The Islamic Movement of Iraq Shi'as[M]. Boulder: Lynne Rinner Publishers, 1992.
- [7] Charles Tripp. A History of Iraq[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 [8] Keiko Sakai. Modernity and Tradition in the Islamic Movements in Iraq[J]. Arab Studies Quarterly, vol. 23, no. 1, 2001.
- [9] Joyce N. Wiley. The Position of the Iraqi Clergy[A]. Joseph A. Kechichian. Iran, Iraq, and the Arab Gulf States[C]. New York: Palgrave, 2001.
- [10] Juan Cole. The United States and Shi'ite Religious Factions in Post-Ba'athist Iraq[J]. The Middle East Journal, vol. 57, no. 4, 2003.
- [11] Falth A. Jabar. The Wordly Roots of Religiosity in Post-Saddam Iraq[J]. Middle East Report, Summer 2003.
- [12] Pat Lancaster. Holding Out for a Hero[J]. The Middle East, February 2004.
- [13] Michael Rubin. Losing the Shi'a[J]. Middle East Quarterly, Summer 2004.
- [14] Graham E. Fuller and Rend Rahim Francke. The Arab Shi'a, the Forgotten Muslims[M].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9.

On Its Political Role of Iraqi Shi'ite Ulama

LI Fu-quan

(the Institute for Middle Eastern Studies, Northwest University, Xi'an 710069, China)

Abstract: The unique Shi'ite Ulama hierarchy and emulation institution provide favourable circumstances for Ulama to play its political role. Since the establishment of Iraq in 1921, Shi'ite Ulama has undergone a historic course, from its temporary political intervention to a long-term estrangement from politics and even again to its confrontation with the government. On the whole, with the state gaining more power, Shi'ite Ulama's political role and social influence tended to reduce. After the outbreak of the Iraq war, Shi'ite Ulama played a more important role on the internal political stage. However, its political role would be restricted in the long run. The activist Ulama can only share the state power in a normal way while the others will retreat to the tradition of estrangement from politics in the future.

Key words: Iraq; Shi'ite; Ulama; Political Role

[责任编辑: 晓 春]